

冷戰與國際兩極體系

丁永康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一、前言

一九四七年七月美國外交事務 (*Foreign Affairs*) 季刊上刊載了一篇由肯楠 (George F. Kennan) 署名「X」的大作——「蘇聯行爲的泉源」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①文中強調蘇聯共黨政權基於馬列主義的傳統，先天就是敵對資本主義社會，同時蘇共革命以後，長期以少數統治多數，政權始終處於不穩定的狀態，因此又有一種不安全的意識，乃至對內要壓制蘇聯人民，對外要不斷打擊摧毀西方的自由制度。肯楠又指出，美國面對蘇聯向外擴張的壓力，不能期望協調，更不能談政治合作，只能一方面維持本身的富強，展示本身的團結，向蘇聯證明自由制度之可貴，一方面採取堅定的圍堵政策，在蘇聯企圖破壞和平穩定的每一地點，予以同等力量的反擊。②當時美國的杜魯門政府接受了肯楠這篇文章的觀點，作為美國外交戰略的最高指導原則，因此決定了其後美蘇冷戰變遷的大形勢。時隔四十二年後，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 院刊迪達流士 (*Daedalus*) 刊登以「Z」爲筆名的文章「蘇聯終結的危機：條條道路通死胡同」 (*The Soviets' Terminal Crisis: All Roads Lead to Impasse*)。③

「Z」文詳述蘇聯共黨及戈巴契夫的困境，並分析世界強國應如何與莫斯科打交道。基本上，「Z」文反對西方對待戈巴契夫的態度，認爲戈氏的經濟「重建」 (*perestroika*) 計畫，不可能建設成經濟上有效率、政治上民主的形式。西方國家不應援助蘇聯官方機構，而應援助蘇聯私人企業，這樣可以播下市場經濟種籽，逐步在經濟模式上改造蘇聯。④

註① Mr. X,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Vol. 25 (July, 1947), pp. 566-582, or Vol. 65, No. 4 (Spring, 1987), pp. 852-868.

註② *Ibid.*

註③ Z先生的原文登在一九九〇年冬季號 *Daedalus*, 頁一九五至三四四。此註係引自國際先鋒論壇報之摘要，一九九〇年二月五日，頁四。

註④ *Ibid.*

誠如「Z」先生所言，一九八九年被視為共產主義面臨瓦解的關鍵年代，非僅蘇聯一地，從波羅的海以迄中國海，從柏林到北平的共產政權，都發生了致命的危機。⑥ 本文將從下列幾方面來探討冷戰與國際政治理論的關聯性，1. 冷戰體制概念之界定；2. 冷戰體制的三個「形成期」；3. 冷戰體制與國際兩極體系理論之關連性，4. 結論。

二、冷戰體制概念之界定

學術界對「冷戰」所下的定義為：「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美國）與共產黨統治的國家（蘇聯）之間沒有直接戰爭的政治衝突狀態」。⑦ 這種衝突肇因於對立的政治意識形態及地緣政治觀，衝突的型態有軍備競賽、偶發性的間接戰爭特性，包括超級強權的代理人以及其他衝突形式。⑧ 除此之外還包括經濟、文化、心理、宣傳上的競爭。其競爭目的有二：一是在國際上爭取比較優勢地位，二是力圖改變對方勢力範圍內的某些國家的政治和社會制度。

根據楷格利（Charles W. Kegley, Jr.）及維特克普夫（Eugene R. Wittkopf）對戰後美蘇冷戰關係的研究，有下列幾個分期：⑨

1. 謹慎友誼期（Wary Friendship），一九四五～一九四六；
2. 相互敵對及交戰期（Mutual Antagonism and Belligence），一九四七～一九五二；
3. 艱苦談判與緩和行動期（Tough Talk, Accomodative Action），一九五三～一九六一；
4. 和平競爭期（Peaceful Competition），一九六三～一九六八；
5. 和解時期（Défente），一九六九～一九七八；
6. 後和解時期（The Postdétente Era），一九七九～一九八八；
7. 新時代時期（New Era），一九八九～？⑩

註⑥ *Ibid.*

註⑦ Argela E. Stent, ed.,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Soviet Union: American and West German Perspective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5), p. 2.

註⑧ *Ibid.*

註⑨ Charles, W. Kegley, Jr. and Eugene R. Wittkopf, *World Politics: Trend and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ress, Inc., 1985), pp. 48-64.

註⑩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三日，美國總統布希與蘇聯領袖戈巴契夫在馬爾他海舉行臨時非正式的高峯會議，會後雙方均稱美蘇關係已開始邁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職是之故，筆者根據上述的分期，將前三段時期界定為冷戰的「形成期」。四、五、六三段時期界定為「和解期」，新時代時期可界定為冷戰「結束期」。本文祇討論冷戰形成期及其與兩極體系的關連性。

三、謹慎友誼時期：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美、英和蘇聯三國首腦連續召開了三次重要的國際會議，即「德黑蘭會議」(Teheran Conference,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二月)，「雅爾達會議」(Yalta Conference, 一九四五年二月)和「波茨坦會議」(Potsdam Conference, 一九四五年七月—八月)。這些會議(主要是雅爾達會議)達成了許多協議(包括秘密協議)，在國際關係史上稱為「雅爾達體制」。^⑩這種雅爾達體制，基本上確立了同盟國如何協力無條件摧毀納粹德國及日本，並為戰後和平的世界尋找共識。不過美國領導人比較熱衷於建立一個有效的聯合國組織，經由集體安全措施，由強權來管轄國際安全。英國邱吉爾則強調歐洲的權力平衡，避免羅斯福對史達林作過多的讓步。蘇聯領導人則決心鞏固紅軍在東歐(尤指波蘭及俄國人所控制的德國)的領土及政治利益。^⑪在「雅爾達宣言」中，蘇聯同意允許東歐各國舉行自由選舉並成立民主政府，但對蘇聯而言，控制東歐，尤其是波蘭……是俄國安全地帶上最重要一環，蘇聯認為，「民主政府」就是共產政府，「自由選舉」即是支持共產黨的政黨才能參加的選舉。^⑫蘇聯所強調的是雅爾達體制提供蘇聯佔領東歐為其勢力範圍之合法性。而英美反對蘇聯的要求並抵制蘇聯權力的擴張，這才是冷戰之本源。^⑬

一九四六年初史達林與邱吉爾首先發出冷戰的通告。史達林在二月九日宣佈，祇要資本主義存在一天，戰爭是不可避免要求在第三個五年計畫中，人民準備作更多的犧牲，俾便發展基本工業以取代消費品的生產。此話被美國高等法院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認為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宣佈」。^⑭

英國首相邱吉爾則於三月五日在美國密蘇里州富爾頓市(Fulton)發表了一場著名的演說。他在這一演說中強烈譴責蘇聯採取片面政策，違背雅爾達協議，「從波羅的海的斯德丁(Stettin, 波蘭西北之一城市)到亞德里亞海的特里雅斯德港

註⑩ 田志立，「國際政治新秩序的理論源流和科學內涵」，(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中心)，一九八九年六月，頁六八。

註⑪ Joseph Fichett, "Undoing Yalta: 45 Years Later, a New Europ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Feb. 5, 1990, p. 1.

註⑫ John Spani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10th ed., (New York: The Dryden Press, 1985), p. 19.

註⑬ Joseph Fichett, *op. cit.*

註⑭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84*,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1985), p. 38.

(Trieste·義大利北部一海港)·一個鐵幕(iron curtain)已籠罩整個大陸，正使警察政府(police government)統治著東歐」。^⑤邱吉爾強調，蘇聯人不要戰爭，他們所想要的是戰爭的果實，以及他們的權力及主義之無限擴張，莫斯科不僅強行在東歐推行共產主義，而且同時向土耳其、希臘和伊朗等國擴張。祇要紅軍刺刀與坦克能刺入及輾壓過的地方，無不成為蘇聯的勢力範圍。邱吉爾呼籲美國不要立即進行戰後復原，英語系人民應在聯合國原則下組成兄弟聯盟，抵制莫斯科的軍事與政治向外擴張的侵蝕力，並力圖在東歐恢復民主選舉與體制。

美國希望戰後國際間強權能通力合作，維持五十年的和平，雅爾達會議後，美蘇確實建立了某種程度的友好關係。然而由於蘇聯的擴張主義，將勢力伸入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因此和平的幻影遭到了破壞。(此時南斯拉夫已在狄托(Marshal Tito)領導的共產黨控制之下，捷克則籠罩在蘇聯紅軍的陰影下。)蘇聯在這些國家裏建立親蘇的聯合政府，而且由共產黨控制內政部長，掌握警察、國防及軍隊的大權。從權力政治的觀點，蘇聯企圖在其國境外圍建立起一圈以其為核心的緩衝國。

一九四六年莫斯科相繼又對希臘、土耳其及伊朗等國施加壓力，顯然已超越了美國默認蘇聯在東歐勢力範圍之內的容忍度。美國政府認知必須以行動支援英國，以對抗蘇聯進一步的擴張。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肯楠從莫斯科拍了一個長達八千字的電報，指出戰後美國對蘇政策的整個基礎是錯誤的。^⑥他強調蘇聯對資本主義國家懷有敵意，不願加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及關稅暨貿易總協定)，企圖控制東歐，因此他建議美國國務院不能對蘇聯妥協。這封電報得到華盛頓的良好反應和國務院的嘉許，肯楠一舉成名。^⑦

其實美國自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後，便展開對蘇政策重估工作，就民主國家而言，在正常的情況下，民意不可能在一夜之間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決策者無法要求美國人民對蘇聯的謹慎友誼態度在短短時間內迅速轉變為敵對的情緒。因此戰後，普遍民意要求儘速採取復員步驟。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七年，美國把傳統兵力從一千四百五十萬人減到一百八十萬人。採取此種政策的理由，除了上述的國內政治的要求外，另一部分理由是由於美國對於核子武器享有專利權。^⑧總之，在

註⑤ *Ibid.*

註⑥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9.

註⑦ George F. Kennan, *Memoirs, 1925-1950* (Boston, 1967), pp. 292-295.

註⑧ Richard Nixon, *The Real War*, (New York: Warner Books Inc., 1980), p. 155.

此期間，美國政府和人民，無論他們的立場如何，曾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表示了他們對蘇聯的善意、忍讓和諒解。誠如魯卡喀（John Lukacs）認為「唯一應當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負責的是希特勒，不是張伯倫，鐵幕和冷戰的主要製造者是史達林，不是杜魯門。」^{①⑨}

在此期間，美國國內已開始爭論戰後可能的發展，最早是美國商務部長華萊士（Henry A. Wallace）於一九四五年六月在紐約時報上撰文，他認為蘇聯在東歐擴張勢力，建立傀儡政權，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德國敗亡的必然結果，不值得大驚小怪，何況美國也以拉丁美洲為其禁嚮。^②後來他甚至不惜與杜魯門政府決裂，並提一備忘錄給杜魯門，建議說：「我們寧可冒姑息的惡名，也得同意接受蘇聯合理的安全保障。」^③他本人則是年九月辭去商業部長職位。

此外，尚有一學派，^④從經濟因素檢討冷戰起源，此派認為美國在歷史上就和蘇聯有摩擦，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美國外交經濟政策，使美國在全球各地放貸投資，藉此使全球的經濟秩序符合美國的需求和政治目標，就一九四五年至四七年之間美蘇所發生的針鋒相對，可歸納為四個說法：

第一是說美國為了保障戰後在全球的經濟利益，企圖將門戶開放政策擴大實施於蘇聯的勢力範圍；

第二是說美國違背協議，比起蘇聯更加不妥協，同時危害到蘇聯的基本安全；

第三強調美國曾經使用其最初獨佔原子彈的優勢，企圖威迫蘇聯就範，接受美國的戰後安排；

第四修正派指出杜魯門繼任總統之後，完全放棄羅斯福的協調政策，聽從若干好戰顧問的建議，事事和蘇聯敵對。^⑤

儘管美國國內對蘇聯戰後的行為有許多爭論，但基本上美蘇雙方仍能維持謹慎的友誼，而美國對蘇的制衡行動也是在九四六—四七年間逐漸展開，而最關鍵性的便是希臘危機。

四、從相互敵對與交戰期至艱苦談判與緩和行動期：一九四七—一九六二年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杜魯門在國會發表演說，要求撥款四億美元援助希臘和土耳其，他在演說中強調，希臘的陷落

註① John Lukacs, *A New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3rd ed., (Garden City, New York, 1966), pp. 62-63.

註② *New York Times*, June 5, 1945 and March 20, 1946.

註③ 此項備忘錄提出的日期為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註④ 一九六〇年代美國出現修正派歷史學家，被稱為「新左派」(New Left)。其中以William A. Williams, Denna F. Fleming 為代表。

註⑤ 參見 William A. William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New York, 1962); Denna F. Fleming, *The Cold War and Its Origins* (Garden City, New York, 1961.)

，對土耳其、中東、歐洲都會造成巨大的衝擊。他認為「在世界歷史中，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必須在各種不同的生活方式中作一選擇。而通常大家都是選擇自由的生活方式……美國的政策必然是支持自由人民，起而反抗境內少數武裝團體或國外武力的征服行動……我們援助自由人民……援助應著重經濟和財務方面，因為這方面的援助對經濟穩定和有紀律的政治行為是最為重要的。」此即為著名的「杜魯門主義」。^②

肯楠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外交事務季刊上署名「X」的著作——「蘇聯行為的泉源」，基本上是延伸一九四六年二月的長電，他的分析著重於共產黨對世界的看法，此為美國對蘇「冷戰」的政策理論基礎。

依據肯楠對蘇聯行為的評估，其要點如下：^③

1. 蘇聯政權的政治性格是意識形態與環境的產物。

2. 蘇聯的意識形態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史達林主義而來，基本上強調(1)唯物史觀，(2)唯物辯證法，(3)無產階級革命，(4)資本主義含有自毀的種子，(5)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6)共產主義革命將由經濟先進國家首先發生轉變成先在經濟低度開發地區發生。(7)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先天存在不可妥協的矛盾。

3. 不安定的國內外環境，迫使蘇共領導人奪權成功之際，即強調有必要建立獨裁政權。

蘇聯領導人認為(1)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人在蘇共取得政權之前，就不斷反對共產主義，而且又干涉蘇聯內戰；(2)共黨建立政權時，僅代表少數統治，先天對國內外環境上有不安全感。因此如何鞏固政權，建立領導人至高無上，絕對不會犯錯的權威成為當務之急。因此史達林對內整肅異己，對外敵視西方資本主義社會。

4. 美蘇之間的紛爭是長期性的。蘇聯具有敵意並不表示他會以一次決生死的行動，在特定的時日內推翻資本主義，對共產黨而言，在追求目標時，小心、謹慎、靈活及欺騙都是必要的，而且會持續不斷地增加達成目標之壓力。

面對這樣一個向外尋求弱點以求擴張勢力，試圖填補權力真空的蘇聯，美國究竟應採何種政策？肯楠建議，美國必須採行一種「長期的、有耐性的、堅定而警覺的圍堵政策（containment policy）。肯楠認為對蘇聯的外交交涉與拿破崙或希特勒這些獨裁者相比，有時容易，有時更難。此話怎講？「就某一方面而言，蘇聯對力量對比十分敏感，在外交談判的個案中，一旦發現對手實力太強，便會立即轉強硬為馴服，因此由權力的邏輯與理論來看，是十分理性的。從另一方面而言，

註② Spanier, *op. cit.*, pp. 29-33.

註③ Mr. X, *Ibid.*, p. 852.

註④ *Ibid.*, p. 861.

蘇聯很難被擊敗，也不會因為對手在某方面獲得一次勝利，便沮喪不振。她藉著耐心與堅持，不但能有效地化解一些不利的偶發事件，而且能運用多變個性及機智與其對手長期週旋。」^②

除了上述的「杜魯門主義」及「圍堵政策」之外，美蘇雙方在一九四七年中期以後又相繼提出一些對抗性質的外交經濟政策及多邊和雙邊的軍事同盟的政策。例如，美國為援助歐洲各國的經濟復興，由國務卿馬歇爾（George Marshall）於哈佛大學發表演說，提出所謂的「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③該計畫認為：「美國須儘可能幫助這個世界回復其正常的經濟健康。缺少此種健康的經濟，就不能有政治的安定與確實的和平。」他並聲明，這種復興歐洲的計畫，須由歐洲國家主動提出，美國的任務為協助制定計畫，並量力支持其實施。同年七月美國、奧地利、比利時、丹麥、法國、英國……等歐洲十六國舉行「歐洲經濟合作會議，商訂一九四七年至五一年「歐洲復興計畫」（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這計畫取得美國同意後，十六國成立「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簡稱OECC），俾有效運用美國馬歇爾計畫在此期間援助的一百廿億美元，其主要目的是以經濟的復興圍堵共產主義的擴張。

一九四九年美國又與英國、法國、比利時等西歐十五國在巴黎商議成立「多邊輸出管制協調委員會」（Coordinating Committee，簡稱COCOM），^④共同規範美國與盟邦對共產國家實施戰略物資禁運，以免威脅西方之安全。而蘇聯為了反制美國及其盟邦所採取的外交經濟措施，亦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建立類似的政經組織，稱之為「經濟互助委員會」（The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簡稱CMEA或COMECON），^⑤以加強蘇聯與東歐各國經濟間的相互依存，免受西方經濟孤立，同時禁止其成員與西方各國從事貿易，除非獲得蘇聯允許。蘇聯此舉是回應美國的馬歇爾計畫。^⑥美國的馬歇爾計畫付諸實行後不久，西歐各國仍面臨蘇聯強大的軍事威脅。整個歐洲大陸軍力仍是不均衡的，蘇聯在東歐及中歐有三十個師的兵力，而美、英、法三國祇有十個師的兵力。^⑦情勢變得非常明顯，軍事安全已成爲歐洲復興的必要條件。^⑧一九四九年四月，比利時、加拿大、丹麥、法國、英國、冰島、義大利、盧森堡、荷蘭、挪威、葡萄牙與美國共同

註② *Ibid.*

註③ 劉季洪，*第五社會科學大辭典*，國際關係，第四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年），頁一三七。

註④ Joan E. Spero,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3r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5), p. 349.

註⑤ *Ibid.*, p. 346.

註⑥ *Ibid.*

註⑦ Gaddis, *op. cit.*, p. 72.

註⑧ Spanier, *op. cit.*, p. 40.

簽署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簡稱 NATO)。^②北約組織是美國在冷戰初期所簽的第一個多邊軍事同盟組織，美國期望透過區域性的安全體系，以維持歐洲大陸的權力平衡。^③

「北約組織」是美國基於「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及「權力平衡」(the Balance of Power)所建構的一個模型，根據此模型及冷戰的蔓延，美國又在全球各地區建立類似的多邊及雙邊同盟體系，如一九五一年，與日本簽訂「安保條約」(Security Treaty)；同年與澳洲、紐西蘭的三邊「安全條約」；同年與菲律賓簽定的雙邊「共同防禦條約」(Mutual Defense Treaty)。一九五三年與大韓民國簽訂雙邊「共同防禦條約」；一九五四年又與英、法和二個東南亞國家簽定多邊的「東南亞集體防禦條約」(Southeast Asia Collective Defense Treaty)，以及與我國簽定雙邊的「共同防禦條約」。^④

反觀戰後，蘇聯在東歐的向外擴張及協助亞洲的共產黨奪權，共建立了十一個共產政權。一九四七年九月建立了蘇聯、波蘭、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義大利及法國九個歐洲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一九五〇年二月與中共簽定了「『中』蘇共友好同盟條約」；^⑤此外又於一九五五年五月與東歐共產黨國家簽定了多邊的軍事同盟「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Pact)以對抗西方的北約組織。

從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一九五五年華沙公約成立，「冷戰體制」才算真正的形成。在這十年間經歷了不少危機，諸如：一九四八年的柏林封鎖危機；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淪落到中國共產黨手中；一九五〇年六月的韓戰、一九五五年中共砲擊金馬外島。從這些事件中可說明二件事情，1.美國對歐外交政策在集體安全加上權力平衡，以及軍經援助的綜合運用之下雖獲成功，但却導致了一項殘忍命運的轉變，因為蘇聯在歐洲擴張受阻，遂將施加壓力的箭頭轉向亞洲。2.就美國的國家利益而言是「重歐輕亞」，歐洲的戰略地位最重要，亞洲則次之，因此祇要蘇聯在西歐採取任何行動，便可能與美國掀起全面戰爭。由一九五二年共和黨艾森豪總統主政時，國務卿杜勒斯(John Dulles)倡議具有攻擊性的「解放東歐」政策，企圖揭開鐵幕，^⑥可得到證明。然而在亞洲，中國的淪陷，美國袖手旁觀，以及韓戰爆發，美國故意採取使韓戰局限化

註② *Ibid.*

註③ Kenneth W. Thompson, *Cold War Theories*, Vol. 1, (Baton Rouge, Louisiana: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54-178.

註④ Steven J. Rosen and Walter S. Jones, *The Logic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rd. ed., (Cambridge, Mass.: Winthrop publishers, Inc., 1980, p. 245.

註⑤ 北京經濟學院政治教研室，當代世界政治經濟和國際關係，(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四。

註⑥ Zbigniew Brzezinski, "How the Cold War was Played," *Foreign Affairs*, Vol. 51, No. 1 October, 1972, pp. 181-209. 另外，參見 Keesley and Wittkopf, *op. cit.*, p. 55.

的政策，不願因介入亞洲人的戰爭而引起與蘇聯的全面性戰爭，而最終仍以北緯三十八度線劃分南北韓收場。^②

艾森豪政府的「解放政策」只是在口頭上一種強硬的威脅政策，而不是以行動來支持該政策。一九五三年六月間發生在東柏林和東德其他城市的反共黨暴動事件，以及一九五六年底發生的蘇聯武力鎮壓匈牙利革命及干涉波蘭事件，便是最佳明證，艾森豪政府均無意介入，祇是口頭上譴責赫魯雪夫。此外，發生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共砲擊金門與馬祖事件，美國也只是間接介入後勤運補工作，未直接介入戰鬥行列。美國對海峽兩岸的政策乃是致力於現狀的維持。

在一九五三至一九六二年期間，基本上美蘇雙邊的衝突因時、因事而異，有些時候兩超強關係似乎有明顯的解凍，如一九五五年七月美蘇英法所舉行的日內瓦高峯會議，會中艾森豪總統提出停止冷戰的八點計畫與建議，但並未獲得蘇聯良好的回應，雙方仍存有歧見。又如一九五九年九月艾森豪與赫魯雪夫在大衛營懇談，雙方同意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歧見，雙方無意於進行核子大戰之冒險行動。此外，有些時候，美蘇兩超強似乎又處在戰爭爆發邊緣，如一九六一年八月，蘇聯對「柏林封鎖事件」以及一九六二年的「古巴飛彈危機」。最後幸賴兩超強在核子武器的僵局及邱吉爾所謂的「恐怖均衡」(balance of terror)^③下才化解了彼此的危機。

在美蘇艱苦談判與緩和行動期(一九五三—一九六二)，美蘇兩大陣營中出現了一些鬆動的現象。戰後從歐洲及日本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中脫離而獨立的一些新興的亞非國家，日益加入國際政治舞臺，先後於一九五五年在印尼萬隆舉行亞非會議，標榜中立不結盟政策，其後又於一九六一年九月在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Belgrade)舉行「不結盟國家會議」，這些國家形成一個第三世界的「中立集團」，以制衡東西(即美蘇)集團國家。

此外，美蘇兩集團各自的內部也發生一些分裂的現象，諸如蘇聯集團，自一九五三年史達林死亡，赫魯雪夫在蘇聯與東歐國家進行反史達林運動，使得國際共產運動的一元化領導與控制削弱。因此有東德、匈牙利的抗暴運動，中蘇共在一九五六年關係已破裂，蘇聯的技術人員與經濟援助撤離中國大陸。美國集團也有裂痕，首先有法國戴高樂要求歐洲的「非美化」(de-Americanized)主張，^④使得美國在歐洲應付蘇聯挑戰的有效性受到質疑。其次，拉丁美洲國家則愈來愈不滿美國的老大哥姿態，開始有歸屬第三世界的趨勢，無視與美國的軍經關係。古巴的卡斯楚奪權成功，改奉馬克思主義，為美國帶來嚴重的後遺症，終於引發一九六二年的「古巴飛彈危機」。

註② *Robert Spanier, op. cit., pp. 52-70.*

註③ *Rosen and Jones, op. cit., p. 271.* 及參考，季辛吉著，胡國材譯，核子武器與外交政策，(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七十一年十月初版)第一章，頁一—一五。

註④ *Ibid., p. 248.*

五、冷戰與兩極化國際體系之關聯性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歐與中歐的衰敗，華盛頓與莫斯科取代倫敦與巴黎，成為世界政治的中心，美蘇兩超級強國各自根據對立的意識形態，歐洲勢力範圍及戰利品的劃分、核子武器的壟斷，以及亞洲殖民地勢力範圍的爭奪，^②幾乎將世界劃分成自由與共產二個陣營。國際政治學者卡普蘭（Morton A. Kaplan）根據大量的美蘇對抗的資料，並利用科學方法，加以分析整理、解釋，最後歸納為六種國際體系，符合當時情勢的有兩種，一為緊密的兩極體系（the tight bipolar system），一為鬆散的兩極體系（the loose bipolar system）。^③

基本上從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五年間世界權力分配是嚴密的兩強對峙的不均衡體系。^④如果把所有的權力資源^⑤一併考慮，美國領導之集團所具有的影響力比蘇聯大。其原因是美國擁有較多的盟邦，而且是遍及全球，而蘇聯的聯盟則是區域性的。美國擁有較多的經濟實力與資源供應，由此可說明嚴密的兩極對峙體系不必一定要雙方力量勢均力敵。^⑥如圖（一）顯示。因為權力是相對的，在西歐這個關鍵地區，基本上美蘇及其盟邦北約及華約的軍事實力，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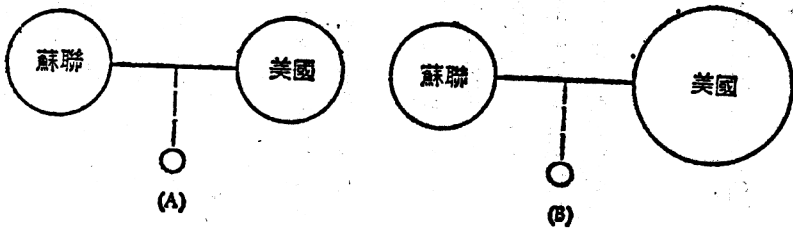
註③ 請參考 Richard W. Mansbach and John A. Vasquez, *In Search of Theory: A New Paradigm for Global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400, 以及 Rosen and Jones, *op. cit.*, p. 244.

註④ Morton A. Kaplan,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67), p. 21. 卡普蘭在此書中提出了六種國際體系模型，它們分別是(1)均勢體系，(2)鬆散的兩極體系，(3)緊密的兩極體系，(4)全球體系，(5)層級體系，(6)單位否決體系。這六種模型是為了分析現實的與未來可能的世界情況而設計的，其中祇有緊密的兩極體系及鬆散的兩極體系可作為解釋冷戰體制形成期的現象。

註⑤ 參考林碧招，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七十九年），頁三〇三至三四四。另外參考 Brzezinski, *op. cit.*, pp. 203-204. 布里辛斯基從四個因素來分析(1)相對的國際影響力，(2)軍事力量，(3)經濟力量，(4)國內政策基礎。

註⑥ Wolfram F. Hanreider,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ipolar or Multipol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No. 9, pp. 299-308. Hanreider 認為無論主要集團有多少（尤其是兩個集團的體系），世界權力分配可以用平衡（symmetry）或不平衡（asymmetry）來分析。他對完美的與真正的嚴密兩極對峙體系作了圖解。此外，布里辛斯基在一九七二年十月號外交季刊中亦持相同看法。

圖一 (A)理想的嚴密兩極對峙體系
(B)1945-55年間實際的兩極對峙體系



致維持均勢，在全球上，則美國的實力比蘇聯的實力略勝一籌。

緊密兩極體系有下列一些特性與美蘇冷戰有關聯性：

1. 體系呈現兩極化。在兩個集團之間存在很明顯的壁壘，這些包括意識形態、國家利益和一般認知。在這個體系內，所有的國家，尤其是強國均得加入以美蘇為主對立的陣營中，沒有任何一個強國可以自由在地扮演權力平衡的角色。雙方在各方面的競爭非常激烈。從最政治化的政治行爲，例如軍事發展、締造盟約到一般的文化、體育活動均帶有競爭的性質。
2. 軍事干預的普遍化。造成軍事干預普遍化的原因有：(1) 兩元體系的競爭性質，爲了強化本身的力量，美蘇不允許各自領導集團內的國家有不合作或不友好的對外政策。(2) 美蘇兩超級強國具有實際干預的權力。(3) 地區性的動亂或衝突使得軍事干預成爲必要的手段。如蘇聯在一九四八年、一九五三年分別干預波蘭與東德，美國在一九五〇年干預朝鮮半島的南北韓軍事衝突以及干預臺灣海峽的緊張情勢。
3. 全球性對峙。美國與西歐盟邦成立北約組織（一九四九）、蘇聯與東歐盟邦成立華沙公約組織（一九五五）；在東亞地區，美國與日本、韓國、中華民國、菲律賓、澳洲及紐西蘭成立雙邊軍事協防條約；在東南亞地區、中東地區、拉丁美洲地區也有類似的軍事聯盟。此外，蘇聯與中共的友好同盟條約（一九五〇），也是構成戰後兩極化的重要因素。
4. 軍備競賽激烈。在此對峙體系中，各國均非常強調「高階政治」（high politics），^④即強調軍事力量與安全的重要性，美蘇兩超強莫不爭相發展武器，以期獲得優勢，蘇聯在一九四九年發展原子彈成功，打破美國原子武器獨占的時代即爲一例。
5. 緊密兩極對峙體系內，兩個集團之間的競爭是一種「零和競賽」（Zero-Sum Games）。^⑤即衝突的一方（美國）有所得，必爲另一方（蘇聯）的所失，反之亦然。誠如陶意志所言：「在我們的時代，相似的零和觀念曾支配了冷戰理論的基本解釋，適用於敵對國家間的權力競爭，尤其是敵對的意識形態。」^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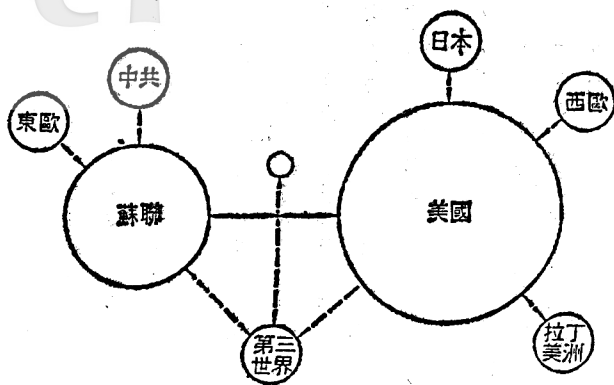
國際政治在一九五〇年代中期之後，緊密兩極體系的國際關係結構已出現了鬆動的現象。卡普蘭將它稱爲「鬆散的兩極對峙體系」。如圖(一)顯示。東歐共黨國家、中共、日本、西歐各國、拉丁美洲各國及其他的第三世界國家，他們的自主性日

註^⑤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7), p. 24.

註^⑥ Karl W. Deutsch,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nd. ed.,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Englewood Cliff, 1978) p. 139.

註^⑦ Deutsch, *op. cit.*,

圖二 鬆弛的兩極對峙體系1955-62



益增加。

在此鬆散兩極對峙體系中，除了延續緊密兩極對峙體系中的一些特徵，如全球對峙、軍備競賽、軍事干預。其他的特徵都有些變化。

1. 不結盟運動日益盛行。在緊密對峙體系中，國際社會的成員，迫於形勢，沒有所謂「牆頭草、兩邊倒」的現象，也就是說，必須加入美蘇集團中的一個，以求自保。但在一九五〇年代中期後，一些新興獨立的國家，它們的特徵是貧窮、落後，以及非由白種民族組成的。美蘇兩超強對它們百般追求，每一方均想招納它們為意識形態的附從者。但這些國家為避免介入美蘇對峙的爭端漩渦中，紛紛加入不結盟運動行列，在國際社會形成一股中立的政治勢力。

2. 兩個超級強國領導的聯盟體系分別開始「鬆弛」。每個集團內都有衝突與信心的喪失。衝突導致原來對集團忠誠削弱或改變；原來對盟主的依賴也開始消散。以蘇聯共黨陣營為例，有幾項重大發展：(1) 東歐國家對蘇聯控制的不滿，如一九五六年匈牙利抗暴活動。(2) 中蘇共於一九五七年分裂。以美國民主陣營有因西歐經濟重建的巨大成功，逐漸對美國經濟控制產生不滿。拉丁美洲國家對美國的軍經援助也日益不滿。

3. 經濟的獎勵與剝奪作為外交政策的工具日益重要。美蘇兩個盟主為了維持聯盟的最佳組合，運用經濟的因素（諸如以獎勵與懲罰來影響弱國），日益與集團安全需求武器供應與撤離同等重要。即「低階政治」(Low Politics)，^⑤與高階政治在國際關係的議題 (Issues) 上一樣重要。

4. 兩超強之間的遊戲規則亦由零和競賽，轉變成「非零和」競賽或「混合動機」(Mixed-Motive Games) 競賽。因為核子武器的毀滅能力，美蘇兩超強在衝突或危機的處理上不似以前以零和競賽收場。季辛吉在其核子武器與外交政策一書中力倡在核子時代除了和平別無選擇，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⑥一九六二年的「古巴飛彈危機」是最好的例證。

註⑤ Keohane and Nye, *op. cit.*, 此指經濟、貿易與社會福利。
註⑥ 季辛吉著，前引書，頁一三四。

六、結 論

本文基本的研究觀點是把冷戰體制視為一個美蘇兩超級強國及各自代表的民主與共黨集團之間的政治互動過程。本文研究的範疇也只局限於冷戰的形成期（一九四五至一九六二）及其對國際政治理論建構之間的關聯性。從前面的分析，吾人可得到下列一些結論。1. 冷戰體制的形成及其遊戲規則由國際體系中最主要的成員（Actors）——美蘇——根據它們的國家利益來決定。2. 美蘇兩大主角在冷戰體制中並沒有直接的軍事戰爭，祇是政治衝突，或間接的軍事對抗。3. 蘇聯行為規律是列寧所擬定，由史達林、赫魯雪夫執行。即用刺刀試探，假如碰到鋼鐵則退縮，假如碰到爛泥則繼續深入。蘇聯是以軍事及領土擴張為利潤動機。4. 美國在二次戰後，由解除武裝，到重整武裝，以優勢核子武力、經濟實力及聯盟體系圍堵共產主義擴張。美國是以經濟及國際尊嚴（Privilege）為利潤動機。5. 美蘇及其集團之間的衝突，時而如臨戰爭爆發邊緣（如柏林封鎖及古巴飛彈危機），時而和緩（如日內瓦高峯會議及大衛營會談）。6. 美蘇對抗的範疇一直在轉變，從史達林——杜魯門時代的歐洲及遠東的對抗，到赫魯雪夫——艾森豪時代將上述的衝突延到第三世界的爭取。7. 戰後的兩極對峙體系受美蘇冷戰的影響演變出來。這個兩極體系是沒有個人化的，換言之，它不會因美蘇領導人去留而改變，它是隨著兩國的經濟實力，及其他國際體系成員（如西歐各國、日本、中共、及第三世界國家）的興盛而變化。8. 在緊密兩極對峙的冷戰體制中，國際關係的議題與議程（agenda）結構呈現一種層級（hierarchy）的特性。⑨以軍事及安全議題為首，在這個層級性的議程結構中決定其超強及其盟國間的政策優先次序。不僅武器或其他戰略物資的交易，要符合這項安全的考慮，即令是單純的商業往來，也在其監督之列，因此，經濟的利益必須附屬於安全利益之下。9. 在兩極對峙體系中，美蘇兩超級強國得分別對其他盟邦提供「公共財」（public goods），⑩諸如美國得提供西歐及日本軍經援助、核子保護傘及開放的市場。蘇聯得對東歐各國提供軍經援助、較低價格的石油及天然氣等。這些受保護的國家因搭便車（free-rider）而發展其國內的經濟建設。

註⑨ Keohane and Nye, *op. cit.*, p. 25, 以及參考 Mansbach and Vasquez, *op. cit.*, p. 97.

註⑩ 公共財係財政學中的一個古老課題，指政府得提供給人民基本的財貨與勞務，如國防、警力及法律與秩序的維持。此處乃利用此概念到美蘇的聯盟體系中，美蘇得提供其盟邦成員的安全保護的財貨與勞務，而盟邦的其他成員則屬搭便車者。

*

*

*